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 (Joe Biden) 終於在1月下旬喧囂紛擾的情況下就任，在特朗普主義 (Trumpism) 的制約下，新一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會否出現轉變？白宮易主會否迎來中美關係緩和的契機？本刊4月號將有專文評述剖析，敬請讀者留意。

——編者

「抵抗」之外的多元抗戰史敘事

在近年來的抗戰史研究中，形形色色的戰時「合作者」開始愈發受到學術研究者的關注。他們往往不像傳統敘事中的抗敵英雄或「附逆」的「漢奸」那樣非黑即白、忠奸分明，而是處於不同程度的「灰色地帶」。朱燾的〈日軍需求與鄉保「合作」：溫州樂清淪陷期間鄉村秩序的重構〉（《二十一世紀》2020年12月號）是筆者目力所見的又一揭示抗戰中「合作者」複雜性的出色研究。

相較於已有的「合作者」研究，如卜正民 (Timothy Brook)、傅葆石，以及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與葉文心的著作，本文最大的突破在於將考察視野從地方精英與城市知識份子進

一步下探至鄉村地區的一般民眾，尤其是圍繞日軍的所在地日常需求，如徵購糧食、獲取補給、情報收集等，以揭示溫州樂清地區的百姓如何以種種不同的方式去應對這些需求。

根據文章分析的「合作」百態，有些村民或自願或被迫地選擇為日軍充當翻譯；有些窮苦者面臨房屋被日軍佔據的窘境，為了生存也只好為日軍做飯洗衣來謀生；有些村民則為了「一塊錢」之類的物質利益，為日軍充當尋路和熟悉地方社會的「嚮導」；還有些消息靈通的村民會成為日軍的「情報員」，蒐集地方市場生意的信息，甚至充當「臨時購買員」的角色。更有甚者，因生計無着，主動選擇為日軍「背鹽當腳夫」。這些日常合作的景象儘管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所涉及，但往往是作為「附敵」或「附偽」的漢奸行為而予以貶斥，因而缺乏有針對性的具體研究。本文對不同「合作者」的具體境遇的分析，很好地補足了這一既有研究的缺憾。

日軍在中國鄉村地區的戰時「需求」以及圍繞這一需求產生的村民與日軍當局的互動，是本文關注的另一重要議題。面對維持地方秩序與更好地獲取糧食等需要，日軍佔領當局

嘗試在鄉村建立更為機制化與系統化的地方社會控制體系，在原有的保甲制基礎上形成了新型戰時合作機制，但也時刻面臨着盤根錯節的鄉村宗族勢力與不同派別的地方游擊武裝的挑戰。作者認為這不啻為一種「鄉村秩序的重構」，但通讀全文後，筆者個人感覺似乎稍為言過其實。儘管「『合作』從一種隨機行為演變成規章制度」是不爭的事實，但縱觀中日戰場及其他淪陷區政權與地方社會的互動情況，這種轉化更多的是佔領當局為維持社會秩序所必然邁出的統治常態化的一步。而一旦佔領軍隊被反抗武裝擊敗或其統治難以為繼，則地方秩序往往迅速退回戰前的基本狀態。從這一角度觀之，日軍的戰時統治未必真能達到「重構鄉村秩序」這樣的程度。

本文大量引用了中日兩方的檔案史料，尤其是在對日文史料的蒐集上下了很大功夫，這一點對還原日軍在鄉村社會的日常需求與所面臨的挑戰而言至關重要。概言之，本文確實是難得地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抵抗」之外的多元抗戰史敘事的扎實文章。

安劭凡 北京
2020.12.16

文革前「勞動教育」的異化

石岩發表的〈文革前勞動教育的觀念和實踐：以中學教育為例〉（《二十一世紀》2020年12月號）一文，細緻而貼切地梳理了文革前十多年中國大陸

中學「勞動教育」的由來和演變，縝密而深切地概述了這種「勞動教育」的特性和取向。

「勞動教育」可謂1950年代後期至1970年代中國大陸中學教育的某種性狀或某類癥結。由於新中國在這一時期缺乏接納眾多中等學歷以上學生的資源和條件，更主要的是自1950年代後期屢屢不斷而愈益激進、偏執的社會群眾運動以及領袖一黨的意識形態訴求，勞動教育必然帶來由緩解學生就學或就業的壓力到強調勞動謀生和鈍化教育職能的轉化，必然出現把勞動教育的實施和普及衍繹為造就文革「新人」的宿命。

進而言之，勞動教育的觀念和實踐還與自1949年後實行的「村落般」的單位制度、「不服從者不得食」的計劃經濟制度、「與生俱來的身份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限制遷徙和限制流動擇業」的城鄉街居制度等密不可分，正是在這些制度的制約下，勞動成為橫亘二十餘年的一代青少年中絕大多數人的生計或出路。格外值得矚目的是，比較於對城市中學生的影響，勞動教育對於農村中學生來說是一生一世的；比較於對中心地區中學生的作用，對於邊遠地區中學生而言多是至關全域的；比較於對所謂家庭出身根正苗紅的中學生的關係，對於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中學生來講則是天生致命的。

幾乎所有經歷過勞動教育歷練的中學生，每每具有學業的天折、學識的淺陋、心靈的

放逐和命運的坎坷……在此之際，勞動淪喪為限制人、壓抑人甚至懲戒人的異化過程，教育蛻化為趨向無知、無能、偏頗甚至愚昧的境地。因此，在這裏，「勞動」不可能成為健全的勞動，「教育」不可能成為真正的教育。

唐少杰 北京
2020.12.7

理性主義危機與情感主義出路

在一個深度後真相時代，中國網民的信息乃至民主素養調查是非常必要的。馬得勇的〈理性至上抑或立場先行？——中國網民的信息認知能力與輿論態度〉（《二十一世紀》2020年12月號）一文提供了一個科學而規範的研究樣本。文章的結論證實了認知不一致和認知一致的被調查者所展現出的能力、素質和行為差異，為把握當今中國網民的認知狀況和民主水平，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切入口和參照系。

閱讀本文會啟發我們思考一些尚未經過系統反思的根本性問題，而這些問題將會決定我們如何重新思考網民的認知能力。首先，本文提供了一個經典的自由主義框架，即理性主義視野中個體自由權利與個體認知能力的互構關係。如果我們把互聯網看作是一個自由的世界，那麼這一立論當然是正確的。然而，在如今的網絡世界中，個體更多被捲裹在更加緊密的社會關係和政治經濟邏輯裏，單單依靠個體認知能力的提升是無法打破壁壘的。如何容納多維的圈層身份和動

態的政治經濟力量，將是全面認知作為一個集體而不是個體的中國網民，其輿論態度的多維光譜及其合法性的方法論挑戰。

其次，社交媒體主導了賽博空間(Cyberspace)的情感主義轉向，理性主義在這個過程中面臨着後真相的內容產製環境的制約。因此，重建理性秩序是一個選擇，認識情感傳播的合理性是另一種選擇。與其以不一致與否來評估網民個體的認知能力，不如充分考慮這種二元對立所抹殺的媒介平台之間的差別，以及在立場和選擇背後的情感動能。換句話說，對傳統媒體的認知與對新興媒體的認知，存在着情感上的差異。以中國為例，前者更聚焦於國家和族群身份，後者更傾向於社會關係的塑造。因此，對兩者的態度和選擇差異並非是對立關係，而恰恰是共生關係。這也有助於平衡學術研究中內含的精英主義傾向。

最後，為了問卷調查的需要，本研究不得不簡化了一些複雜問題——比如市場與國家關係的簡單對立、「黨管媒體」在所有權和管控實踐上的複雜性和動態性，以及境外媒體是異質信源但是否獨立媒體仍需商榷——從而獲得較為準確的答案。未來的研究也許可以把此類語境化和歷史性的問題考慮進去，或者結合更多的闡釋性分析，將「中國網民」這個極具國族中心主義色彩的概念複雜化，而不是本質化，在強調其理性選擇的同時，也關注其感性表達和意義建構，還原一個人的社會性。

姬德強 北京
2020.12.21